

文史资料选辑

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十二辑

(总122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本辑编辑：刘 剑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22辑

（总122辑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劲松装订厂装订

*

1991年2月第一版·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6.25插页： 字数：155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 7—5034—0243—1/K·181

定价：3.30元

目 录

我的戎马生涯……………李 觉(1)

求学时代——从军初期——十年歧途——八年

抗战——起义前后

· 两 广 事 变 ·

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……林 虎(24)

何键在两广事变中玩弄两面手法……罗子雯(29)

· 人 物 述 林 ·

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……………宋景昭(36)

· 忆 旧 谈 往 ·

创办汤池训练班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杨显东(51)

张学良三次派我去陕北红区……………周相臣(64)

· 民 盟 史 料 ·

四川民盟策动川康军政人员起义概述…张松涛(67)

· 经济史料 ·

雪泥杂记——我的创业生涯……………章剑慧(91)

无锡老家——初出茅庐——荣氏兄弟——迁厂

奇迹——创办了各项企业——西北建厂——接

收日本纺织厂——徬徨和抉择

回忆《中国实业志》编纂经过……………冯和法(107)

· 艺术史谭 ·

永不反悔的路……………张 权(111)

童年的歌——启蒙者——流亡学生——留学生

涯——黄金岁月——恶梦——难忘哈尔滨十七

年——也许是多余的话

齐派艺术的传人 娄师白……………邹士方 秦宝春(132)

“抓周”时他抓了毛笔——听“封箱戏”——巧遇

名师——正式拜门——言传身教师徒情——

改名——“老师健在，我决不出名卖画”——创

新——足迹遍及海内外——《齐白石绘画艺术》

出版

· 旧案重提 ·

关于光绪之死……………案存者(147)

狱中奇遇

——与金树仁谈金树仁案……………濮清泉(153)

漠北纪游.....封鹤君(172)

补充·订正·质疑

蒋经国处决雷庆春绸布店老板失实...雷良璋等(180)

我亲身经历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实况

——订正楚溪春《“三·一八”惨案

亲历记》中的几处谬误.....杨春洲(182)

我的戎马生涯

李 觉

李觉，湖南长沙人。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，后投唐生智，曾参加北伐战争。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，屡立战功。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。1949年与程潜、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，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委员，第五、六届政协常委。

我姓李名觉，号云波，在家时又名淑志。湖南长沙人。祖父去世早，无叔伯。父亲因家境艰难，读书不成，改为经商，流寓云南一带。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，共生一女三男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我生于1900年旧历五月初十。当时，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，父亲为安全起见，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。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，在乡下买得水田15亩。安置妥贴后，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，不久即病死在昆明。当时，我只两岁，最大的是姐姐，也只9岁。母子们无依无靠，幸亏家有薄产维持。母亲勤劳节俭，生活严肃，具有极端忍苦耐劳的倔强性格，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。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，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，不畏艰难的好品德。母亲为了教子成名，光宗耀祖，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。两个哥哥学工科，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。

求学时代

1906年，我入县立初小读书。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，创立了新学，学堂不收学费，但还是要拜孔夫子。

我10岁那年，进入县立高等小学，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。这些旧的教育，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，守礼奉法。第二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我才11岁，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，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。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，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。母亲非常着急，节衣缩食，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，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。

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，一读又是3年。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，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，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，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，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。

1916年，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。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。学习不到半年，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，京城大乱，无法上课。停学半年，局势平稳后，重新入学。两年后，爆发了“五·四”运动，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北洋军阀政府不许学生“闹事”，派了一连士兵来“保护”学校，不准外出集会，不准看报会客，接电话都有限制……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，又决定提前放假，各自回家，到下半年才复学。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第一次懂得了“爱国光荣，卖国可耻”，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。

1919年底，我在这所军校毕业，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。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，全是日本装备，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。但我们这批经过了“五·四”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，因此常

常与日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齟齬，激起纠纷。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，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。半年后，发生了直皖战争，段祺瑞战败倒台，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。于是，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，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，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。

从军初期

1920年11月，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。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，并对湘军实行整编。我回到长沙后，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，说：“唐团长，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，每月津贴大洋10元，请您帮忙作个转荐。”唐生智听后，半天没做声，最后才说：“良相出自州牧，猛将来自行伍。想带兵的人，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，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。”于是，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。

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，士兵毫无纪律可言，生活作风也非常腐败，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；全靠营长周至柔（湖南郴州人，保定二期毕业）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，骨干力量显然不够。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，是抱着很大期望的。但我们当时都只十八、九岁的青年。“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”，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，是没有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。因此，讲话无人听，做事无人帮，使我感到非常苦恼。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说：“你们把老姜烧热了去烫嘴唇，可以烫出胡子来的。不信，你们试试看。”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，但我信以为真，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。结果，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。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，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，同事加同乡，自然好相处。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，不怕吃苦，不摆架子，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，作劳役。

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，虽然言语粗俗，动作野蛮，但都很识好歹，很讲义气，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，还亲切地叫我“小排长”。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、保护我。

1921年夏，湖北发生宣武兵变。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、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，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“援鄂军”，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。6月，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，王占元宣布下野。^①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，并派四艘兵舰，由水路进攻岳州，大败赵军。当时，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，率兵冲在最前面，我也随在其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，心中未免有些畏怯。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，进攻在前，退却在后，深受感染，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。唐问我：“怕不怕？”我说：“旅长不怕，我怕什么？”唐生智点头赞许，此后对我十分器重。这年10月，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；但读了三个月后，直奉又发生战争，学校又解散，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。一个月之后，局势平稳，我才又去保定带职复学。

1922年5月，我在保定军校毕业，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。该团团长是刘兴，他具有极端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，平日腰杆挺直，一点不弯；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，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一样，身先士卒，非常勇猛。这一切，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。

这时，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。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，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，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。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，和张国威一起，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，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枪的队伍。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，后因程潜下台，而被唐生智收编为骑兵营

^① 据《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》记载，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。

营长。此后，他随唐生智作战，屡有战功，得升团长、旅长。他有五个女儿，大女儿何玫秀外慧中，颇有见地，立志要嫁一个老实忠厚的年青军官。于是由唐生智作伐，我和何玫订立了婚约。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长沙结婚。婚后不久，谭赵战争又起。这年7月，谭延闿在广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号召，组织“讨贼军”，赵恒惕则以维护联省自治的省宪为名，组织“护宪军”。两军相峙，赵恒惕一面派叶开鑫抵御湘南谭军，一面派唐生智、贺耀组对湘西蔡钜猷军发起攻击。开始时，赵部一师师长宋鹤庚、二师师长鲁涤平以及旅长吴俭学、谢国光等均纷纷附谭倒赵，声势浩大，赵督岌岌可危。幸唐生智挺身而出，在打败蔡钜猷后，又与叶开鑫、贺耀组等一起奋力作战，将谭军及宋、鲁、吴、谢等部一古脑儿赶出了湘南，赶到了广东。这时我还在刘兴部下，不恋新婚燕尔，奋勇当先，立下了战功，被擢升为第二旅第十四团二营营长。

1924年，唐生智被赵恒惕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，驻衡阳。唐实力不断壮大，所部扩充到四个旅，十五个团，达五万人枪，以刘兴、李品仙、何键和周斓分任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旅长，成为湘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队伍。这一年，我被调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三营当营长，从此归属到何键部下。同年秋天，赵调第四师到广西支援陆荣廷打内战。唐生智对此不感兴趣，只派了我等少数几个营的兵力，到全州附近的黄沙河，将被李宗仁等打败了的陆荣廷接到永州，即算完成使命，不再深入桂境。

1925年，第四师的官兵在唐生智亲自倡导下，全部加入了佛教，实行“五戒”（即戒偷盗、戒妄语、戒乱杀、戒邪淫、戒酗酒），我也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斋戒行列。当时我们这些营以上的军官，绝大多数都由衷相信唐生智、顾伯叙先生所倡导的“自利利人，救人救世，猛勇精进，慈悲喜舍”等宏愿及大无畏精神，相信这是修养军人身心最好的教义。加之，顾先生精通佛学密宗，

尤会瑜伽气功，能够飞身腾跃，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当时这些很科学的特异气功，被一般无知的人说成是邪术，唐、顾等人因不愿泄露密宗真义，也不肯多加解释，只是潜心修正道，如实知自心。其实，顾先生专心致志于此，对唐生智的具体军政事务并不过问，只是帮唐分析大局，顺应时势，这对唐生智及我们第四师后来终于进一步倾向革命，参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

1926年初，唐生智在湘南掀起讨吴驱赵运动。3月，赵通电辞职，唐生智到长沙就任代省长。4月，吴佩孚援赵，率军南下，我们在唐生智指挥下奋起抗击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6月，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，所属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改为第四、五、六师及教导师，官佐皆上升一级，我也由营长晋升为团长。

7月，我随同第八军全体官兵一道，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。湖南是先有共产党，后有国民党的，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，如夏曦、郭亮、李维汉、易礼客等。他们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，我们这些军人对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都不甚了解。我去问唐生智：“怎么去年入佛，今年又入党？”他说：“佛化党化二位一体，唯心唯物是两极相通的。”我又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他说：“国民党讲三民主义，主张‘天下为公’，大同世界；共产党讲‘人类解放我解放’；我们佛教也说‘众生解脱我解脱’，这不都是一致的么？”当时，说得我十分信服。

8月，我随何键师从长沙出发，过岳州后一路疾进。在一次战役中，我带着全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，冲过城陵矶狭长的新堤，长驱冲入汉阳附近。这时，何键等已策动汉阳守将刘佐龙参加了北伐军，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城和汉阳兵工厂，获得了大量的军械。后来，利用这军械物资，仅第八军就扩大装备了五个军。

9、10月，汉口、武昌相继被我军攻克，我又随唐生智、何键进军鄂西宜章、沙市，肃清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，并向

巴东、秭归方向戒备。

1927年2月，袁祖铭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偷袭长沙，截断北伐后路。周斓奉唐生智密令，在旧历年关摆下鸿门宴，智歼袁祖铭于常德城。此时，我也接到密令，进驻澧州，相机策应，尽歼了袁军残部，解除了北伐军后顾之忧。此役，袁祖铭的警卫团长许克祥倒戈投诚，被编入何键部下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，何键亦蠢蠢欲动。一日深夜，在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司令部里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决定会后第三天拂晓，将留在武昌的第四军全部解决，并扣押俄国顾问鲍罗廷。当时议定：汉口由李品仙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；武昌由何键负责。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，负责阅马厂地区；当即看好了地形，作了部署。会后，周斓打电话密报唐生智，因此正待按期行动时，唐生智从河南前线拍急电回汉，命令停止执行，并限所有部队于次日集中大智门江岸一带，开往河南驻马店待命，继续北伐到底。

上述几件事情，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志北伐，统一中华的爱国之心；佩服他那除奸务尽，不搞内讧的鲜明爱憎。此时，我虽然已颇具战斗经验，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的团长了，但是，讲老实话，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，以致终于在后来迷失了方向。

十年歧途

1927年5月，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。反动派“反共驱唐”的阴谋得逞，迫使唐生智“分共”，终于停止北伐。7月，我随军从河南驻马店调回武汉，在汉口广济、武穴一带集中。8月，唐生智坚持东征讨蒋，我又随军开赴九江集中，随即由黄梅、宿松、桐城进入安庆、合肥一带，迫使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。

这年11月，李宗仁、谭延闿、程潜又联合起来西征讨唐。我奉命随军撤退。唐生智要求我们在一星期之内，日夜兼程退回湖北圻春。但这时芜湖和安庆已失守，退路已受到威胁，乃绕过崇山峻岭，到圻春集中。由于山路难行，部队疲惫不堪而节节败退。回到武汉的当晚，即听说唐生智已下野，并已东渡日本。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，也非常难过。从此，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。

1928年3月，唐生智所部五个军在退到湖南后发生了分化。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和十七军军长周斓随唐生智一同引退外，第八军李品仙和十三军叶琪投靠了桂系，三十五军何键则为程潜所收容，最后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。我是何键的女婿，自然也只能随何附蒋，还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和器重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却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对我的提携培育之情，也忘不了第一个顶头上司刘兴，忘不了良师契友周斓。唐母、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，亲如一家，因而我对唐、刘、周三位就更加眷念。

1928年5月，取唐生智、周斓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，突然被桂系军阀诱至武汉扣押起来，鲁涤平继任省主席。当时，困守湘西的何键与鲁关系不好，蒋介石乃乘机派刘文岛与何键秘密联络，意图去鲁用何。与此同时，桂系为与蒋介石争夺势力范围，亦图争取何键，乃于1929年2月，挟武汉政治分会之权，派李明瑞师偷袭长沙，驱走鲁涤平，迎何键为省主席。何键处于两者之间，左右为难；正在彷徨之际，蒋介石却为稳定局势，顺水推舟，于这年4月正式委定何键就任。何键喜出望外，欣然应命，自此，即在蒋、桂及其他各大派系的夹缝中图存发展，在湖南当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。我也以何门长婿、何部主将的身份，走上了歧途。

1929年夏，桂系见何为蒋用，又欲以叶琪取代何键，并从汉口派兵逼近长沙市郊。城内人心惶惶，纷纷逃避。这时，我毫不畏怯，一面维持城内治安，担任最后掩护，将部队安全转移到湘

西，一面与蒋介石联络，夹攻进犯之桂军，终于取胜。于是，我部又回到长沙，我也因功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。四个月后，长沙城内发生特大抢案，在各方面压力下，何键只好将我撤职，叫我仍去做团长，调赴新宁、城步、武岗一带攻剿张云卿。在新宁期间，我做了一件好事：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为邀功请赏，诬陷该县两个中学校长为“共党”，报请省清乡司令部严惩。我奉命查办。经查证，纯系陷害，乃不予受理。

1929年秋，蒋介石对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队实行讨伐，李宗仁在汉口立足不住，派人见何键，要求通过长、衡退回广西，被何键婉言谢绝，只得由宜昌、沙市经澧州、桃源、溆浦、新宁进入广西。蒋介石密令我部就近堵击，我则认为：政局变化无常，今日是敌，明日是友；今日打垮桂系，明日则要吃掉我军，湘桂终属邻省，唇亡齿寒。于是，我命令所部让开大路，只占领侧面阵地，假意佯攻阻击，实际上等于放鞭炮欢送他们撤回广西。其他各路湘军也效法我，只瞒住了蒋介石一人。后来，湘军整编，四个军改为四个师，军长改当师长，而我却由团长晋升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旅长。

1930年初，唐生智在河南接管桂系军队后，第二次兴兵反蒋，密邀何键响应，蒋介石亦派刘文岛来笼络何键。我当时极力主张弃蒋就唐，何键却只佯许之，回电唐曰：“如打到武汉，当响应。”另一方面，又向蒋表示“服从中央”。后，唐生智失败，何键安然无恙。我则挨了何键一顿臭骂，说：“要是依你附唐，则同归于尽，死无葬生之地了。”

1930年秋，长沙被红军攻占。这时，我旅正驻扎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一带，奉命回师驰援；红军主动退至浏阳后，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向长沙进攻，并在文家市附近歼灭了何军一个旅；我等只好退回长沙城内，固守了一个多月才解围。随即追击红军至江西萍乡。这时，驻在江西的鲁涤平、谭道源等则利用何键的这次挫折，大肆攻讦，欲取何而代之，他们还联络闲居在南京方面的湖

南人士叶开鑫、贺贵严等共同反何，指责他搞封建割据，只重用醴陵人，搞“非醴勿用”。何键吓得不亦乐乎，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。蒋介石此时想利用这些矛盾，以湘制湘，因而仍支持何键任湖南主席，并重新整饬湘军部队，撤换了反对何键的三个师长，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师师长之职，极力维护何派势力。

1930年冬，澧州被湘西红军贺龙部攻占，我奉命前往增援，并指挥陈渠珍师，罗启疆旅等部收复澧州，迫使贺龙红军退往鄂西。蒋介石乃倾全力“围剿”江西红军，任何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司令，意欲尽驱湘军入赣，为其效力卖命。这时，我向何键建议，还是要保存本部实力，否则只会落得个“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”的下场。于是，何键乃留我的十九师为总预备队，滞驻省内，分散在岳阳、蒲圻、衡阳、常德一带，始终不肯入赣“剿共”。两年后，我兼任师党部特派员；移驻平江、浏阳等地，专做后方安抚工作。当时湘鄂边区疫病流行，双方均无战斗。我在后方，接触许多“自新”的共产党，亲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屡战不溃的奥秘。于是，也学过他们一些方法，如不准杀人，优待俘虏，保障“自新”人员生命财产等，使安抚工作颇具成效，受到蒋介石的表扬，命我专司此职。这也使我在1931至1933年期间，避免了去江西与红军主力作战，逃避了被歼灭、被击溃的危险。

1933年，湘军大部调往江西后省境空虚、政局不稳，而要新编军队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，于是我协助何键将各县地方团队利用起来，以县为单位进行整编，进行集中训练。积少成多，一时竟达到四个师，二十四四个团的兵力。经费由全省统一征收附加税解决，军事方面由省保安处统一指挥。我兼任了保安处处长。这无形中增加了何键维持湘局的力量。

1934年11月，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，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四省边防区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陈诚规定何键所部负责担任以澧州、石门、慈利、大庸、永顺、桑植、保靖、龙山之线的防

守，并规定：如果红军从谁的正面地区突破，则该地区的指挥官有失职之责，将严加惩办。其目的是把带兵官撤职，将部队兼并过去，据为己有。此时我正由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一月归来。刚结业即率军进发湘西。我的十九师的防地又是最长、最容易被突破的。怎么办？于是我请何键将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摆在常德一带，靠近陈诚的总部；因王东原与陈诚是保定第八期同班同学，私交甚厚，过从甚密，因而情报较灵，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，能帮助我们湘军各部避实就虚。这时，陈诚自己的部队却被红军在大庸、桑植境内消灭了一旅，并在慈利溪口附近，被红军突破了封锁线。而我十九师等何系部队战线长而戒备无虞，受到总部嘉奖。于是，我又擢升为第四路纵队司令，统率第十六、十九、六十三等师继续尾追红军，一直追到云南、昆明，均无差错。在此之前，何键曾被蒋介石撤销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职，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升代。此时，却因我的被擢升而使何键又取得了对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权。

1935年冬，我的纵队到达昆明后，蒋介石即命令留驻不动，藉以代表中央军控制云南，以达到用杂牌制杂牌的目的。这当然是我们湘军很不情愿的事，我乃以请假省亲为名，回湘请示何键如何处置。时两广酝酿反蒋，与云南也取得了联系。李宗仁、白崇禧派唐希忭来长沙联络何键一同参加，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创局面；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碍他们的行动。何键正感军队远处边陲，受人所制，亦思有所活动，乃征询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老蒋该反。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，两广又有何能耐？要他们搞出一定规模，我们才好表示态度。”何键深以为然，乃派我以回防云南为幌子，顺道去桂林一探虚实。于是，我于回长沙后第三日，即乘自备汽车前往广西。李、白派人迎至黄沙河，我又乘专机经柳州到南宁，向白崇禧转交了何键的亲笔信。李、白决定派李品仙、唐希忭陪我再次同机返湘，与何键再作进一步商谈。而何键乃一面派我与之周旋；一面通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蒋介石告